

# 孔孟仁爱和佛教慈悲之比较及其现实意义

霍进凤

(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思想,并在孟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是孔孟道德规范体系的指导原则。而慈悲精神则是佛教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和重要修行方法。孔孟仁爱思想和佛教慈悲精神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也有着不同见解,如施与对象、立论基础、践行要求和终极目标等四大方面。首先,在施与对象上,孔孟仁爱 and 佛教慈悲都涉及了人和物两个层面,但前者是爱有差别,而后者则是无差别的平等之爱。其次,在立论基础上,孔孟仁爱主要从人的心性角度来阐发仁爱乃是生发于人的恻隐之心;佛教慈悲则主要是基于智慧观照下对于苦难众生的关注。再次,在践行要求上,孔孟仁爱的方式重在能“推”,举措集中体现于世间法;佛教慈悲的方式则重在有“智”,举措兼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在践履上都具有极大的自觉能动性。最后,在终极目标上,孔孟仁爱 and 佛教慈悲都有着相同的入世情怀,但前者强调存仁入政,主张经世致用;而后的落脚点在于出世,最终归旨于上求下化。孔孟仁爱思想和佛教慈悲精神在当代依然有着现实意义。通过对二者的比较与探讨,梳理出圣贤理念中的共通之处予以借鉴、取舍其不同见解以期互补,可以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提供善策良方,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关键词]** 孔孟仁爱;佛教慈悲;比较;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22,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6-0065-08

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思想,并在孟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是孔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指导原则和最高准则<sup>[1]</sup>。而慈悲精神则是佛教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和重要修行方法,贯穿于整个佛教教义。孔孟的仁爱思想和佛教的慈悲精神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也有着不同见解。本文基于二者的同异进行了比较与探讨,主要集中在施与对象、立论基础、践行要求和终极目标等四大方面,试图梳理出圣贤理念中的共通之处予以借鉴、取舍其不同见解以期互补,从而使其在现代社会的构建中继续发挥积极意义、达成不忘本来而又面向未来的现实助益。

## 一、何者受施?

### 孔孟仁爱与佛教慈悲的面向

(一)孔孟仁爱的对象。孔子的仁爱首先关注到的对象是人的层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sup>[2]</sup>(《颜渊》)并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sup>[2]</sup>(《学而》)仁爱的基础在于孝悌,当孝顺爹娘、敬爱兄长,也即仁爱的首要对象是自己的家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sup>[2]</sup>(《学而》)然后在此血缘之亲的基础上扩展开来,继而爱其他人,最终达到“泛爱众”<sup>[2]</sup>(《学而》)的境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sup>[3]</sup>(《礼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sup>[2]</sup>(《颜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sup>[2]</sup>(《雍也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sup>[2]</sup>(《公冶长》)。并从利民惠民的角度出发认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sup>[2]</sup>(《宪问》),“民到于今受其赐”<sup>[2]</sup>(《宪问》),通过和平手段达成统一而使百姓能免于战争之苦难、人民到今天还受到好处,如此大功泽民亦是仁的体现。孔子关注人,但是同样也关注到了物:“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sup>[2]</sup>(《述而》)孔子年少时贫困,曾经迫于生计而从事捕猎,但他用鱼竿钓鱼而不用大网捕鱼,用弋射的方式获取猎物却从来不射取归巢栖息

**[收稿日期]** 2019-05-10

**[作者简介]** 霍进凤(1981-),女,河北秦皇岛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的鸟兽,表明了他对自然生物的珍惜爱护之心<sup>①</sup>,也彰显了先古“仁厚及于鸟兽昆虫”的境界<sup>②</sup>。孟子的仁爱对象同样涉及到了人和物两个层面,他明确指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sup>[4](《尽心上》)</sup>的总观点。但同样认为仁爱的首要对象在于“亲”的层面,也即自己的亲人,尤其双亲,强调“亲亲,仁也”<sup>[4](《告子下》)</sup>，“仁之实,事亲是也”<sup>[4](《离娄上》)</sup>，“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sup>[4](《离娄上》)</sup>，“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sup>[4](《梁惠王上》)</sup>。但同样认为仁爱不能仅仅止于“亲”的层面,还应该继续扩展,打破“亲”和他人之间的隔阂,打破血缘和非血缘之间的障碍,不仅能骨肉亲亲,也能做到同类相亲,从而推亲及人,上升到“民”的层面,做到“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sup>[4](《梁惠王上》)</sup>。但孟子认为“仁民”层面也并非仁爱的终点,还应该再一次地继续扩展,打破人与物的隔阂,将仁爱推至“物”的层面,从而做到“爱物”。“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sup>[4](《梁惠王上》)</sup>见不得动物活着的时候被血淋淋的宰杀、听不得动物被杀时痛苦求生之哀嚎,是仁心的体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sup>[4](《梁惠王上》)</sup>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应该爱护节用,使其持续发展,体现了对大自然也要投以伦理爱心的关照。

(二)佛教慈悲的对象。佛教的“慈悲”是慈与悲二者的合称。《大智度论》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sup>[5]</sup>也即: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悲。佛教的慈悲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住众生相、不计回报、慈心无条件是谓“无缘大慈”,观一切众生与己身同体而生起悲心是谓“同体大悲”,所以慈悲乃是无差别的平等之爱,讲求普爱众生。“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这里的“一切众生”包括了所有的有情众生,所有的众生都

是平等的。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上的慈悲,不仅人与动物(畜生)平等,六道中的所有众生(包括地狱、饿鬼、天、阿修罗等)都是平等的,都要以一慈悲心肠等爱普度,正所谓慈悲摄受、怨亲平等。“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sup>[6]</sup>从广义上讲,佛教的慈悲不仅包括有情众生,也包括无情众生,如草木金石、山河大地等,人们也应懂得慈悲惜物、节用惜福,不可随便毁坏和任意糟蹋浪费。

由以上可以看出,孔孟仁爱 and 佛教慈悲在施与对象上的相同点在于:从对象的范围上来讲,都涉及到了人和物两大层面,都有着爱人惜物之心,对众生充满了关怀与爱怜,尤其是其中对人的关怀是二者在理念上的相通之处,是共具的伦理品格,有着可贵的人本内涵,体现了对人的共同的社会关怀。但是二者在具体施与的轻重上却有所区别:孔孟的仁爱对象虽然也都涉及到了人和物,但是其爱是有差别的爱,有近远亲疏之别。人和物,重在人,而人的对象里,又首在亲。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曾谈到:“今恩足以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sup>[4](《梁惠王上》)</sup>可见,禽兽和百姓的地位是不能划等号的,所谓物轻人重,次序不可颠倒。孟子又认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sup>[4](《尽心上》)</sup>对待亲、民、物的仁爱之情应该是略有差别的,他用不同的词汇进行了简单区别,也即:亲(亲近)、仁(仁爱)、爱(爱惜)<sup>③</sup>。同样,在孔子那里,人也是比物重要的多。论语中曾记载这样一个事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sup>[2](《乡党》)</sup>孔子的马棚失了火,孔子从朝廷回来先关切询问人的伤亡情况,体现了孔子一贯的“仁者爱人”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对人的关怀更重于物的“贵人贱畜”<sup>④</sup>之倾向。有时在特定情况下,物甚至是可以做出牺牲的。如“子贡欲去

① “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钓者,以缴系一竿而钓取鱼也。网者,为大网,罗属著网,以横绝流而取鱼也。钓则得鱼少,网则得鱼多。孔子但钓而不网,是其仁也。弋,缴射也。宿,宿鸟也。夫子虽为弋射,但昼日为之,不夜射栖鸟也,为其欺暗必中,且惊众也。”(参见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第107页,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版)。“洪氏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参见朱熹《四书集注》第9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② 《孔子家语·五帝德》记载了宰我请教黄帝的事迹,孔子提到黄帝“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论语诠解》中认为儒家吸纳了这一文明社会早期的思想,孔子的“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彰显了“仁厚及于鸟兽昆虫”的境界。“本章乃描述孔子平日行事之富有仁德也。虽仅九字,却是圣人德性之流露”,“可见孔子仁爱万物之心。”(参见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第127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年版)

③ “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杨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所谓理一而分殊者也。’”这里明确认为仁爱有序、且有差等,统言皆仁、理一分殊。(参见朱熹《四书集注》第34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④ “此明孔子重人贱畜也。”(参见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第157页,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版)。“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参见朱熹《四书集注》第1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告朔之饩羊”时，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sup>[2]</sup>《八佾》相对于羊的牺牲，维护祭祀之礼更加重要。此外，家畜还可以被宰杀为人类所食用，“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割不正，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沽酒市脯不食。”<sup>[2]</sup>《乡党》从《论语》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儒家并非因为爱物就到了断肉戒荤的层次，反之，还在食肉方面多有讲究。《孟子》中也多次提到上了七十岁年纪的老人可以食肉，并认为“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sup>[4]</sup>《尽心上》。喂养家畜，不错过繁殖期，老人就不缺肉吃了，且“七十非肉不饱”<sup>[4]</sup>《尽心上》，食肉对老年人还是尤其必要的。由此可见，孔孟的仁人爱物虽然并举，但总体上还是重人胜物，物很多时候是服务于人的。而佛教的慈悲则如前所述，是平等之爱，无分别亦无差别，是阳光普照，是甘露同润，人和动物都是有情众生，皆当一视同仁。因此，在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尤其是在其生死问题上，佛教的慈悲情怀要远比儒家的仁爱来得彻底得多、深重得多。在佛教的基本戒律“五戒”之中，第一重戒就是戒杀生。“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方便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自恣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sup>[7]</sup>“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sup>[7]</sup>不仅是人，包括动物，“一切有命者”都不可故意杀害，无论方式是直接抑或间接，无论何种形式。不仅不可杀，爱生的同时还要力行放生，进行救护。与此同时，与杀生密切相关联的食肉行为也是断然不可的。佛陀曾在《大般涅槃经》《梵网经》等多部经中提到不可食肉，强调“食肉者断大慈（悲）种”。所以佛教的慈悲对动物同样厚重，甚至有时对动物的慈悲不比人来得轻薄，从佛本生故事里的“舍身饲虎”“割肉喂鹰”等就可见一斑。佛教的慈悲之于动物不仅厚重，同样也是非常细致的。如《毗尼日用录》中就有提到佛弟子在饮水之时，当念“饮水偈咒”：“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若不诵此咒，如食众生肉。唵嚩悉波罗摩尼莎诃。”<sup>[8]</sup>佛教认为溪水、河水里都有虫等小生物存在，其性命亦不可杀害。所以当时佛陀规定，僧人饮水要用漉水囊过滤后才能饮用。此

外，类似的细致关照还有很多，此处不再赘举。

## 二、仁爱与慈悲何以可能？

### 孔孟与佛教之别

孔子对于仁爱的来源并没有做什么探讨，但孟子延续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解决了仁爱的发起这一问题。孟子主要是从人的心性角度来阐发仁爱情感来源的。他认为，仁爱生发于人的“恻隐之心”，也即“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sup>[4]</sup>《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sup>[4]</sup>《告子上》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体现为柔软温和的同情心、怜悯心，此心乃是人的一种固有的天性，无关名利和个人喜恶，不具功利性和主观倾向，属于人性的自然流露，尤其在面对众生陷于苦痛危难之时最能得以刺激凸显。如乍见幼童快掉入井中的惊惧紧张体现的是对人的恻隐，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远庖厨心理则体现了对物（禽兽）的恻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sup>[4]</sup>《公孙丑上》，恻隐之心是仁爱最初的一点种子和萌芽。只有保护了这点萌芽，才能使仁爱不断扩充开来，进而连同义之端的羞恶之心、礼之端的辞让之心、智之端的是非之心，“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sup>[4]</sup>《公孙丑上》。最后，孟子还认为，从根本上讲，仁爱来自于人们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和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sup>[4]</sup>《尽心上》这种良知良能就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也即纯善本性<sup>①</sup>。

佛教的慈悲则主要是基于智慧观照下对于苦难众生的关注。主要有两大方面：一则缘众生苦所生，二是佛理上的观照。第一，缘众生苦所生。诸佛菩萨之所以生拔苦与乐之慈悲心，实是觉得众生苦多乐少甚或是唯苦无乐。佛教认为，世间众生因造作善恶业而随业力流转轮回于三界六道<sup>②</sup>。人、

① 朱熹认为，“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参见朱熹《四书集注》第3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本然之善、乃出于天，即说明了人的良知乃纯善天然的本性。

② 三界六道：“三界”是指众生居住的三种世界，分别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乃众生轮回之道途，分别是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三界和六道所指的范围是相同的，三界是依据境界的不同进行区分，六道是依据众生业力果报的不同进行区分。欲界包括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和天道中的一部分（六欲天），色界和无色界都在天道。

天、阿修罗为三善道,其中众生相对乐多苦少;畜生、饿鬼、地狱为三恶道,其中众生苦多乐少,而地狱众生则唯苦无乐。轮回六道的众生又受八种苦果: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所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盛阴苦。又有三苦:一苦苦(自寒热饥渴等苦缘所生之苦),二坏苦(乐境坏时所生之苦),三行苦(为一切有为法无常迁动之苦)。欲界三苦皆有,色界有坏苦行苦,无色界则有行苦。此外,还有种种诸苦<sup>①</sup>。概言之,即三界六道皆不离苦<sup>②</sup>,故又称“苦界”“苦海”。《妙法莲华经》譬喻品曰:“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sup>[9](卷二)</sup>因此,诸佛菩萨痛感众生之苦,“譬如父母见子遇患,心生苦恼,愍之愁毒”<sup>[10]</sup>,故而慈悲心起,“菩萨见众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后发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sup>[5]</sup>,更为此上求佛道,证佛果后而说真实法、觉悟众生,使其解脱痛苦,直达涅槃清净境界:“三界皆苦,吾当安之”<sup>[11]</sup>,“当度三界生老病死,令至无为”<sup>[12]</sup>,“除灭一切诸心毒,思惟修习最上智,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sup>[13](卷二十三)</sup>。众生诸苦如是,苦根何在?曰:苦在“迷”字。众生之所以在三界六道中受轮回之苦,实则因迷。缘起论认为,宇宙万法(一切事物和现象)皆由因缘所生起,因缘和合则生,因缘消散则灭。所以,万事万物皆是因缘相待而成,没有固有的规定性,也即无自性、自性空,也即“性空”,是为“缘起性空”。缘起论和业力结合,又形成了业感缘起论,指出宇宙万物都是由有情众生因迷惑颠倒所造之业感召而生成,“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是名缘起法说。”<sup>[14]</sup>惑(无明、烦恼)起生业,由业生苦,惑、业、苦三者互为因果,相续不断,故成三世轮回,此为迷染之因果。“一切众生,皆是吾子,深著世乐,无有慧心。”<sup>[9](卷二)</sup>因迷不知苦反著为乐,是错也。从本质上而言,众生之迷也是众生之苦,因苦无智慧而受诸苦故。如《优婆塞戒经》卷一讲述智者“生悲”的缘起,即提到了“一切众生沉没生死苦恼大海”“迷于正路,无有示导”<sup>[15]</sup>等三十六种众生之苦,其中就把迷苦(“迷于正路”)归入其中。第二,佛理上的观照。首先,基于缘起论起观。佛菩萨正是明悟了缘起性空之真相,依此智慧才对迷苦众生起了慈悲关照。如《妙法莲华经》卷一即提

到:“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嶮道,相续苦不断,深著于五欲,如犍牛爱尾,以贪爱自蔽,盲瞋无所见。不求大势佛,及与断苦法,深入诸邪见,以苦欲舍苦,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sup>[9]</sup>同时,既然世界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彼此相互联系、互为依存,那么整个宇宙在时空上就是一大因缘和合体,由无数依存关系和因果关系构成,进而个人与众生、众生之间、个人与世界、世界与众生即当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同一生命体,正所谓“万法一如”。因此,十法界内的四圣六凡都应生起慈悲心,对众生之慈悲即是对己之慈悲。其次,基于轮回说起观。众生若不能转迷成悟,就会永远在六道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因而无始劫来,彼此都曾互为亲属眷友:“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sup>[7]</sup>《大乘入楞伽经》卷六中也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sup>[16]</sup>,“菩萨摩訶萨在在生处,观诸众生皆是亲属,乃至慈念如一子想,是故不应食一切肉”<sup>[16]</sup>。因此,要求个人当起慈悲心,慈悲看待一切众生如亲属眷友,更不可杀生害命,这也恰是佛教倡导众生当戒杀、放生、食素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虽然都是智上观照,但因修证境界不同,慈悲又可分为三种:众生缘慈(缘众生相而起、观一切众生犹如赤子,为“小悲”,是凡夫之慈悲,以及声闻、缘觉、菩萨最初的慈悲)、法缘慈(开悟诸法无我、观众生但为五阴假和合而起慈悲,是“中悲”,系无学之二乘及初地以上菩萨境界)和无缘慈(知诸法不实、心无所缘而起的平等绝对之慈悲,为“大悲”,独佛具有)<sup>③</sup>。

综上所述,孔孟仁爱 and 佛教慈悲在立论基础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前者的探讨有着浓厚的心理学色彩,后者则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前者理解起来相对通俗直观,而后者则相对抽象思辨。

### 三、践行之道:

#### 孔孟仁爱与佛教慈悲的理路

(一)从践行方式上看,孔孟的仁爱侧重在能“推”,佛教的慈悲则侧重于有“智”,二者的着力处

① 在佛典中,叙述苦的经文为数甚多。在分类上,就有三苦、四苦、五苦、八苦、十八苦、百十苦等。

② 天道虽然寿命长、福报好,但因业力牵引,依然会有寿命终、福报尽、堕入其他五道之时,故仍未出六道而受轮回之苦。

③ 《无量寿经优婆塞愿生偈注》卷上云:“慈悲有三缘,一者众生缘是小悲,二者法缘是中悲,三者无缘是大悲。”(参见电子大正藏,第40册, No. 1819, 北魏昙鸾注解)

不同。首先,孔孟讲仁爱都非常重视推此及彼的同理心,从内在的自我出发向外在的对象换位推恩。孔子重视忠恕之道,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sup>[2](《颜渊》)</sup>和“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sup>[2](《雍也》)</sup>的思想。孟子主张“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sup>[4](《尽心下》)</sup>,认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点就要“举斯心加诸彼”<sup>[4](《梁惠王上》)</sup>;并重视“推恩”,推己及人,广施恩惠:“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sup>[4](《梁惠王上》)</sup>而佛教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基础上,虽然也很强调视他如己的体察心,但同时更重视悲智双运,所谓“智”就是般若实智。悲智双运就是说佛弟子当同时运用大悲心和大智慧来利益众生,从而救拔其苦、助其得道。佛教中讲究“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此慈悲心需以智慧摄持,否则这个慈悲就容易发生异化,或无原则,或不适时,或因自身慧解不足而误导众生,就会适得其反,容易导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的恶果。

(二)从践行的主观能动性上看,孔孟仁爱和佛教慈悲在贯彻践履上都具有着极大的积极自觉能动性。孔子认为,只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经过努力,就可以做到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sup>[2](《述而》)</sup>“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sup>[2](《颜渊》)</sup>“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sup>[2](《里仁》)</sup>并且要求在任何困难考验下都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sup>[2](《里仁》)</sup>对此,他还曾对能长久坚守仁德的弟子颜回大加赞叹,“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sup>[2](《雍也》)</sup>,而其余弟子只能短时间偶尔想到或做到。最后,孔子还推崇仁德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道德品格,为了成就仁德可以牺牲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sup>[2](《卫灵公》)</sup>,“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sup>[2](《卫灵公》)</sup>。“当仁,不让于师”<sup>[2](《卫灵公》)</sup>,要积极地去践行仁道,在这个追求上要勇于担当而无需谦让。孟子认为仁爱之心首先重在悉心地滋润养护从而使其生长,若反复夜养昼害,如斧斫木,此心就会泯灭丧失:“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则其违禽兽不远矣。”<sup>[4](《告子上》)</sup>并认为“君子以仁存心……仁者爱人。”<sup>[4](《离娄下》)</sup>“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旷安宅而弗居……哀哉!”<sup>[4](《离娄上》)</sup>“仁则荣,不仁则辱。”<sup>[4](《公孙丑上》)</sup>君子

当以仁存心,广施仁爱,这是很光荣的事情;反之,弃仁德、舍安宅,则是非常悲哀和耻辱的事情。“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sup>[4](《尽心上》)</sup>只要不断地勉力践行恕道,就能够以最近的道路求仁得仁。更认为学问之道就在于“求”回仁心:“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sup>[4](《告子上》)</sup>佛教的慈悲精神在践行的主观能动性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普度众生,诸佛菩萨勇于牺牲,可以舍弃一切,乃至涅槃。“尊有胜悲心欲行救济何物不舍?有悲心者为他故涅槃尚舍,况复舍身?!”<sup>[17]</sup>“以大慈悲力故,久应得涅槃而不取证。”<sup>[5]</sup>再如: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其宏愿似海;观世音菩萨倒驾慈航、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随类度化。他们的大愿大行都体现了秉承慈悲、利乐有情的大无畏魄力。同时,也因秉承慈悲心怀,大乘菩萨能于无始劫的生死轮回中为度众生而百折不挠、始终如一,不生厌烦退转、精进如一:“亦以大慈悲力故,于无量阿僧祇世生死中,心不厌没。”<sup>[5]</sup>

(三)从具体践行措施上看,孔孟的仁爱侧重世间法,而佛教的慈悲则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兼有,二者有同有异。孔子讲仁侧重在“礼”,主张克己复礼,言行当以礼为准则:“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sup>[2](《颜渊》)</sup>且认为其有四大纲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sup>[2](《颜渊》)</sup>并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sup>[2](《阳货》)</sup>他还认为能够从眼下的实际情况选择例子做起就是实践仁道的方法,“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sup>[2](《雍也》)</sup>孟子讲仁侧重在“政”,更多地是结合国家社会的治理来进行贯彻的,极力主张实行“仁政”,强调“发政施仁”<sup>[4](《梁惠王上》)</sup>,并提出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sup>[4](《梁惠王上》)</sup>“制民之产”<sup>[4](《梁惠王上》)</sup>“善教”<sup>[4](《尽心上》)</sup>等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但以上无论“礼”还是“政”,都是世间法的层面。而佛教的慈悲之举则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相融并行,集中要求于身口意三大方面,所涉及领域更加宽泛,行为规范也更具体些,主要体现在四摄六度、五戒十善等教义戒律中。所谓“四摄”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是菩萨摄受众生的四种善巧方法。第一,布施,有三种施:财施,以金银、财宝、饮食、衣服、医药等物惠施众生,这叫外财施;以体力脑力施舍他人,这叫内财施。法施,

即讲经说法、赠送佛经光碟、将功德回向众生等。无畏施,即让众生不再感到畏惧,如施与医药、解救危难等。第二,爱语,即对人说话,都要和颜悦色、善言慰喻、说诚实话、柔和语。第三,利行,也即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第四,同事,也即同止同作、同学同修,打成一片。所谓“六度”即是布施、持戒(止恶修善,饶益有情)、忍辱(内心能安忍一切外在境界)、精进(以纯一直进之心,自度度人,无有退堕)、禅定(止观双修,不被尘转)、般若(也即智慧,圆融无碍的正智)。所谓“五戒”则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所谓“十善”即十种善业,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其中四摄六度中的“布施”和五戒十善中的“戒杀”(不杀生)乃是慈悲心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

#### 四、孔孟仁爱和佛教慈悲的终极指向

孔孟的仁爱重在“入世”,尤其是在齐家治国方面,强调践仁成圣、内圣而外王。如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结果即是“在邦无怨,在家无怨”<sup>[2]</sup>(《颜渊》),家、邦皆可获得清明太平。“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sup>[2]</sup>(《学而》),才能治理好千乘之国。孟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则更加明确且丰富得多,他极力推崇和宣扬统治者当施仁政于民、发政施仁。他认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sup>[4]</sup>(《梁惠王上》)又指出:“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sup>[4]</sup>(《梁惠王上》)“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sup>[4]</sup>(《梁惠王上》)发政施仁,不可罔民,制民之产,富足百姓,未有不王。孟子反复强调仁德、仁政对于社稷的重要性,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如:“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sup>[4]</sup>(《公孙丑上》)“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sup>[2]</sup>(《公孙丑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sup>[4]</sup>(《离娄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sup>[4]</sup>(《滕文公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

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sup>[4]</sup>(《离娄上》)“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sup>[4]</sup>(《离娄上》)由此可见,守仁德、循仁政的目的唯在于能存、能保、能兴,小则保身、大则能王,免于废亡。包括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这些珍物节用的措施其最终也是为了达到养民安国的目的:“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而无憾,王道之始也”<sup>[4]</sup>(《梁惠王上》)。因此可见,孔孟仁爱的入世倾向非常浓厚,强调存仁入政乃是经世致用、实现良好政治的关键和最大保障。

而佛教的慈悲,虽然也有在入世层面的种种贯彻,但其最终的落脚点却还是在于出世,集中体现在一个“度”字上,也即: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度化众生离苦得乐、求得解脱、圆成佛道。《妙法莲华经》卷三曰:“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sup>[9]</sup>,诸佛悲心誓愿“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sup>[9]</sup>。菩萨经过累劫修行、成就梵行,本可证得清净涅槃,然而为了怜悯众生,不住涅槃,乘愿受生六道,广开甘露法门,转无上法轮,“犹如大雨,雨甘露法,润众生故”<sup>[18]</sup>(卷下)。《佛说无量寿经》卷上则直言:“如来以无尽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兴于世,光阐道教,普令群萌,获真法利。”<sup>[18]</sup>《妙法莲华经》卷一更是明确指出:“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於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於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於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於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於世。”<sup>[9]</sup>如地藏菩萨之大慈悲也是为了广度众生,使其解脱生死、成就菩提:“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故,各获果证。”<sup>[19]</sup>再如四摄法,也都是菩萨通过种种示现、令一切众生获种种利益和生欢喜心而最终达到调伏众生摄引其归向佛道的善巧方便。“为欲调伏一切众生,随其所乐常令满足。”<sup>[13]</sup>(卷三十二)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作佛事。各种灵活亲和、深具智慧的善行方便最终还是为了达到更好地度化众生的目的。因而,或可言之,佛教的慈悲因初观众生陷于苦而生发,亦最终因度众生离于苦而获得圆满。

由上所述可见,孔孟仁爱 and 佛教慈悲这二者的实现都有赖于现实人生和社会的土壤,有着相同的人世情怀。但孔孟仁爱思想仅止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层面,而治国平天下即是其存仁入政的最高目标;而佛教慈悲精神的最终归旨则在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求众生得离苦”,各种利

民济世的善行方便皆是服务于此。

## 五、孔孟仁爱和佛教慈悲的现实意义

孔孟的仁爱思想和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当代依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前文对孔孟仁爱和佛教慈悲各方面的比较,可见二者有同有异,因此,或可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一则厘清并借鉴圣贤理念之共通之处,二则各取其长使其互补而相得益彰,共同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提供善策良方。

首先,当肯定孔孟仁爱与佛教慈悲的全面关怀和普世情怀。从所施对象角度而言,孔孟仁爱和佛教慈悲都涉及到了人与物两个层面,这是二者的一致性,体现了伦理道德关怀的全面性和广泛性。首先,对人的关怀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提倡的“诚信友爱”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的“诚信友善”是相通相融的。其次,对于物(动物、植物乃至山河大地)的爱护则有利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珍惜资源、取之有度、消费有节的观点也同时符合了我国当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大有裨益。但另一方面,仁爱适为基,慈悲当为标。因为孔孟仁爱所讲求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为首、民随后、物为终,这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内而外的递进之爱,相对于佛教慈悲所倡导的普爱众生,对广大民众来说,践行起来应该更具情理性和操作性。毕竟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一上来就要求人我平等、怨亲平等、物我平等的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若是没有一定的修学功夫是极难达到的。何况就大乘教义看来,连佛弟子中的罗汉、缘觉二乘都但求自了而难发“大慈悲心”,唯有大乘菩萨才能达到,所以落实到众生凡夫身上则更是不易。因而,仁爱适合作为践行的基础阶段,当践行到一定境界时,再提升到慈悲等爱层面。

其次,恻隐心的养护和扩充是当代社会的迫切需要。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有的人经不起各种诱惑考验,导致产生了一些功利心加重、人情淡漠疏远的社会现象,甚至变得麻木不仁、穷凶极恶、残忍至极:有虐待老人、拐卖儿童者,有亲子相杀、夫妻相仇者,有学生殴打师长、师长虐待学生者,有中小學生行校园欺凌者,有因摩擦纠纷而灭人满门者,有电信诈骗、制售伪劣食品者,有遗弃宠物、虐待动物者,等等。都在时时叩问恻隐之心的缺失问题以及警醒大众缺失恻隐之心所导致的后果的严重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sup>[4]</sup>(《公孙丑上》),“仁也者,人也”<sup>[4]</sup>(《尽心下》),作为仁爱

之端的恻隐心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保留人性的最基本种子。失去恻隐之心,仁爱的嫩芽退化枯萎,就会使人变得心肠歹毒,乃至丧失最基本的人格,疯狂地打破道德底线乃至法律红线而做出伤天害理之事,那么不要说仁民与爱物,就是亲亲都会成为问题了,这也正应了孟子所说的“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和旦旦伐之则“违禽兽不远”的论断。因此,要达到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要首先培养和呵护好恻隐之心这个仁爱之端,进而扩充壮大,最终把持住内心的良知、心怀仁爱以待人处物。而佛教慈悲对于现实苦难的关注则有利于柔化铁石心、洗涤暴戾气,从而有利于大众恻隐之心的培养。

最后,就践行要求和终极目标两个方面对孔孟仁爱和佛教慈悲这二者加以取舍借鉴,使其相得益彰。首先,从践行要求上看:第一,孔孟仁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此即彼、换位推恩,可极大对治当代人的狭隘私心、极端个人主义,避免唯利是图、私心冷漠;佛教慈悲的“悲智双运”则让人们的爱心能够更具理性与智慧,效果更加圆满。第二,孔孟“为仁由己”的自觉能动性,可使大众能够主动提升自我的内在修养,从他律转向自律,从而仁在心、仁在家、仁在工作、仁在社会,有利于促进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而佛教慈悲中“何物不舍”的魄力勇气不仅与当今社会的奉献精神相一致而且也会对其起到良好的倡导作用。第三,孔孟的“能行五者”“发政施仁”以及佛教的四摄六度、五戒十善也可以相互补益,共同助力个人道德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其次,就终极目标而言,摒弃佛教慈悲的出世色彩,孔孟仁爱和佛教慈悲所共具的积极入世的情怀也都是当代之所需,仁爱的经世爱民和慈悲的济世救民都可成为新时代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最后,无论秉承孔孟的仁爱思想还是佛教的慈悲精神,最终在社会上所积极践行的都将是各种慈行善举,如敬老恤孤、助学扶教、扶贫济困、救死扶伤、赈灾克难、服务社会、保护环境等各种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引导大众崇德向善、减少矛盾、降低犯罪率,有利于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这也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 [参 考 文 献]

[1] 韩延明.孔孟仁爱思想及其现代教益[J].东岳论丛,

1995. (1).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 陈才俊. 礼记精粹[M].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12.
- [4] 方勇. 孟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5] 龙树菩萨造. (后秦) 鸠摩罗什译. 大智度论: 卷二十七 [M]// 电子大正藏: 第 25 册, No. 1509.
- [6] (唐) 般若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四十 [M]// 电子大正藏: 第 10 册, No. 0293.
- [7] (后秦) 鸠摩罗什译. 梵网经: 卷二 [M]// 电子大正藏: 第 24 册, No. 1484.
- [8] (明) 性祇译. 毗尼日用录 [M]// 电子大正藏: 第 60 册, No. 1114.
- [9] (后秦) 鸠摩罗什译. 妙法莲华经 [M]// 电子大正藏: 第 9 册, No. 0262.
- [10] (北凉) 昙无讖译. 大般涅槃经: 卷十六 [M]// 电子大正藏: 第 12 册, No. 0374.
- [11] (后汉) 竺大力共康孟详译. 修行本起经: 卷上 [M]// 电子大正藏: 第 3 册, No. 0184.
- [12] (西晋) 竺法护译. 普曜经: 卷四 [M]// 电子大正藏: 第 3 册, No. 0186.
- [13] (唐) 实叉难陀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 [M]// 电子大正藏: 第 10 册, No. 0279.
- [14] (刘宋) 求那跋陀罗译. 杂阿舍经: 卷十二 [M]// 电子大正藏: 第 2 册, No. 0099.
- [15] (北凉) 昙无讖译. 优婆塞戒经 [M]// 电子大正藏: 第 24 册, No. 1488.
- [16] (唐) 实叉难陀译. 大乘入楞伽经 [M]// 电子大正藏: 第 16 册, No. 0672.
- [17] 提婆罗菩萨造. (北凉) 道泰译. 大丈夫论: 卷上 [M]// 电子大正藏: 第 30 册, No. 1577.
- [18] (曹魏) 康僧凯译. 佛说无量寿经 [M]// 电子大正藏: 第 12 册, No. 0360.
- [19] (唐) 实叉难陀译. 地藏菩萨本愿经: 卷上 [M]// 电子大正藏: 第 13 册, No. 0412.

(责任编辑: 谢光前)

## The Comparison of Kindheartednes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Buddhist Compassion and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HUO Jin-feng

(Jinshan College of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002)

**Abstract:** Benevolence is the core of Confucius' thoughts and w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Mencius, which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ethical standard system. Mercy spirit is the core of Buddhism ethic, and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Buddhism and important method of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enevolence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mercy spirit of Buddhism, such as: objects of giving, argument founda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and the ultimate objective. Firstly, as for the objects of giving, kindheartednes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Buddhist compassion both involve human and things. However, the former is love with difference, while the latter is equal love without difference. Secondly, when it comes to the argument foundation, kindheartednes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mainly explains that benevolence is born of human compa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Buddhist compass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oncern for the suffering of all living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sdom. Thirdly, with regar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e, the way of kindheartednes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emphasizes "consideration", whose measures are concentrated in mundane laws; In contrast, the way of Buddhist compassion emphasizes "wisdom", and measures of which have both mundane laws and supramundane dharmas; Both of them have great initiative in practice. Finally, as for the ultimate objective, kindheartednes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Buddhist compassion both have the same feelings of entering the society, but the former emphasizes on entering politics with benevolence and advocates statecraft and pragmatism, while the purpose of the latter is to leave the world, and the ultimate aim is to pursue the Buddha-way and guide sentient beings. Benevolence thought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mercy spirit of Buddhism still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two, it can provide a good policy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e to play their positive role by combing out their common points in the concept of sages for reference and choosing their different opinions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Key words:** kindheartednes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Buddhist compassion; comparison; realistic significance